



禹羌华夏说

易 华

摘要:大禹出西羌,治水九州,会盟涂山,禹征三苗,崩于会稽;既是传说也是神话又有历史素地。禹出西羌又称西戎,涂山会盟西羌东夷结合,征三苗西北征服东南,禹崩会稽禹陵犹存。大禹之子启发动甘之战巩固政权建立夏朝,从此进入父系男权社会干戈王国时代。《禹贡》九州雍、梁为羌人大本营,三代正是西北羌人与东南夷人的碰撞交融史。齐家文化贯穿夏代,石峁和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首都与末都。华山(或泰华)与华胥传说亦与华夏相关。神话、传说、历史、考古、民族学与人类学结合,可以系统论证禹羌与华夏文明之关联。

关键词:禹;羌;夏;齐家文化;华夏文明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1-0021-09

司马迁相信大禹出西羌治水九州,是夏王朝奠基者。《史记·夏本纪》实际上是禹羌本纪,大禹故事篇幅超过四分之三,从启到桀四百余年历史只有五百余字记录,篇幅不到四分之一。《史记·六国年表》总结了我国上古史上“东作西收”或“东生西成”现象:“东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一家之言既是夏商周秦汉五朝兴亡的历史总结,也是逻辑归纳结果。

傅斯年根据现存传世文献论证了夷夏东西说: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知此形势,于中国古代史之了解,不无小补也^[1]。陈梦家认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被商人认为是异族^{[2]282}。徐中舒先将夏与仰韶文化挂钩,认为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并从仰韶遗物推论夏代文化^[3];后又将羌与夏联系起来,推

论夏民族迁徙与文化发展^[4]。翦伯赞亦认识到甘肃、青海一带诸羌之迁徙:“一部分沿南山北麓之天然走廊,西徙新疆,与同住塔里木盆地的诸氏族发生接触。中国传说中,许多神话人物皆与昆仑山有关,或与西王母有往来,正是暗示这一历史内容。”^[5]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就考证出九州本来是西方戎族所居之地,后演变为天下之代称九州;四岳本来是戎人所居之处,后演变为平分四方之四岳;禹本来是戎祖宗神,后演变为三代之首君^[6]。在甘肃考察之后,他发现夏可能兴起于西北,所以周人自以为接受了夏文化系统;并且后来在西方创立的国家也多称“夏”,如赫连勃勃、赵元昊等;同时西北的水也多称“夏”,如大夏河、夏水(汉水)等^{[7]195}。顾颉刚晚年从古籍中探索羌族,提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祁连河湟一带,而且青、甘、陕、川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区,正是华夏民族发祥地^[8]。顾颉刚等

收稿日期:2020-01-03

作者简介:易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1),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早期文明研究。

实际上已经逼近“禹羌华夏说”了。现在我们在司马迁记述和先辈学者考证基础上,结合考古新发现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来探讨禹、羌、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之关联。

一、禹出西羌 治水九州

大禹神话传说见于“四书五经”,亦为诸子百家乐道。大禹出西羌见于孟子,司马迁赞成此说。《史记·夏本纪》皇甫谧集解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张守节正义云:“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南朝范晔《后汉书·戴良传》:“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扬雄相信石纽在川西,颜真卿留下“禹穴”。如今北川石纽遗迹和“禹穴”碑可作为大禹出生神话落地生根的证据^{[9]5-10}。

黄河(济水)、长江、淮河流域均有大禹神话传说遗迹。大禹故事是神话传说,亦反映了历史事实,可以用历史和考古发现来说明。《禹贡》以为河源在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贡物是球琳、织皮等。宗日、火烧沟、齐家坪等遗址发掘显示岷山地区到河西走廊一带是高地农业社会与草原畜牧人口的交汇之处,也是早期金属冶炼最活跃的地区^[10];实际上是齐家文化分布区的羌人根据地。《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是指陕西汉中、四川及部分云贵地区:“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江;东为中江,入于海。”《华阳国志》云:“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缀拗为九江。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埴、锦、绣、罽、氍、犀、象、毡、毼,丹黄、空青、桑、漆、麻、纁之饶,滇、獠、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梁州贡道沿白龙江东南下,穿越岷山,入嘉陵江,走陆路进入汉水;从汉中盆地翻越秦岭,进入关中盆地到龙门西河。《禹贡》对以岷山为中心的梁州的金属矿藏物产描述得特别详细。“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班固《汉书·地理志》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有些河流较岷江为长,但历代学者仍尊岷江为正源。宋刻《禹迹图》绘有今金沙江远自西南南下再向东北入川与岷江合流,仍在岷江源头注上了“大江源”。大禹治理岷江,岷江上游松

潘黄龙有大禹庙;玉垒山亦有“禹庙”供奉大禹。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亦云:“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渎都流行大禹治水传说,并有禹庙碑刻遗迹。河南济源济渎庙保存犹为完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羌见于甲骨文,广泛分布于大西北,河南、陕西、山西亦有羌人分布;《后汉书》有系统记述,大西北是羌人世界。羌是商代主要异族人群,常与商人发生战争。武丁时期伐羌兵力最为雄厚:“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310)羌不仅活跃于西方,而且占据北方,又有北羌之称。其中还有多臣羌、多马羌、亚其等,据考证为臣服商朝的羌人^[11]。羌人普遍崇拜岳神,有火葬的习俗。齐家、辛店、寺洼文化有火葬遗存,可能是氏羌文化,也可能是先周文化或夏文化。商代似乎推行过以羌人为人牲的政策,商人常将俘获或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祛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12]2-16}。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契245)。甲骨文中一次用人牲最高纪录是1000^{[13]369-382}。

顾颉刚曾考证出禹有天神性,先秦传世文献中禹与夏不同出,说明禹与夏没有直接关系。但周代青铜器铭文表明禹与夏确实相关。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叔夷钟出现了“翦伐夏后”“处禹之绪”:“虢虢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颛司)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郭沫若认为成唐即成汤,伊小臣即伊尹,禹即夏禹^{[14]305}。甘肃天水秦公簋:“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虢使蛮夏。”王国维指出:“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15]3}大禹亦见于西周金文《遂公盃》:“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遂公盃、秦公簋、叔夷钟有“禹”“夏”铭

文,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对“禹”和“夏”的共同认知。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曾侯宝夫人卅加之墓,出土编钟铭文亦有“禹”与“夏”：“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涇。”^[16]2009年随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编钟也出现了“临有江夏”：“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彻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卅加是楚国公主,“卅”是楚国王族之姓,在古文字中写作“嬭”。叔夷钟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统治九州,卅加编钟和秦公簋强调“禹迹”的同时也强调天命。《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国语·周语下》“帅象禹之功”和《诗经·鲁颂·閟宫》“纘禹之绪”大意相同。上至西周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秦公簋出自秦国,与商人有关联;卅加是楚人,卅本是羊叫声,与羌关系密切。清华简《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亦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禹迹”“禹绩”“禹绪”皆指大禹功业。无论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都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大禹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17]。

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了马家窑风格彩陶,牟托遗址石板墓、双耳罐、青铜器,被确认是羌文化遗存。2003年重庆云阳出土东汉雍陟《景云碑》：“先人伯杼,匪学惊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世本》说：“越,卅姓也,与楚同祖。”卅姓正是楚、越同源于羌的线索。

二、涂山之会 羌夷结盟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音初》禹过家门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于涂山之阳,作歌曰“候人兮猗”。“候人兮猗”被认为是南音之始,周公及召公取风以为《周南》《召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吕氏春秋》佚文说,禹年三十未娶,遇九尾白狐,涂山

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有《涂山歌》更详细：“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亦有《涂山歌》略有不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

《尚书·益稷》大禹自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史记·夏本纪》：“(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涂山之地有会稽(今浙江绍兴)、江州(今重庆巴南区)、当涂(今安徽当涂)、濠州(今安徽怀远)等不同说法,可能会盟不止一次,亦有可能是涂山氏四处迁徙之结果。与涂山女结婚意味着西羌与东夷结盟,大会诸侯于涂山或会稽宣告治水成功,其间还可以小会或中会诸侯。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禹会区禹会村,因“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是龙山文化时代淮河流域代表性文化遗址。禹会诸侯事件是夏代之前大规模盟约活动,夯土祭祀台和大量陶器很可能是大型祭祀活动遗迹,还有棚屋区遗迹可能是禹会诸侯历史的又一重要物证^[18]。司马迁不仅记述了禹会涂山,《史记·外戚世家》明确提出夏之兴以涂山：“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螽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如今禹会村仍流传“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旧称,并且建成了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三、羌夷建夏 夏在西北

《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

涂山氏之女也。”启是西羌大禹与东夷涂山氏之子，羌夷结合建立夏朝才有夷夏之分。夏以干戈立国。《史记·夏本纪》载禹巡视东方，按禅让原则传位给益，益让位给禹子启；有扈氏不服，启卒众亲征。甘之战确立了父子继承制建立了夏朝，也就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父权时代。《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姒”字“女”旁值得注意。《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这说明姓源自母系而非父系^{[19]26-28}。由此可见夏代之前从母，夏代开始从父，父系男权正是夏代开始巩固成制度。《史记索隐》又云：“夏启所伐，鄂南有甘亭。”甘即甘亭，是有扈氏国南郊地名。《后汉书·郡国志》云：“鄂县属右扶风，有甘亭。”《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全图”将有扈氏标注于西安附近^{[20]5-6}。陕西户县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正是齐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区。

夏代历史重戎轻祀明显，孔甲好鬼神事淫乱，而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史记·夏本纪》从启崩到桀亡四百余年，帝崩、子立、失国、征伐是主旋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略有不同：“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载：“古者禹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一》则曰：“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夏朝前期主要面临来自东方夷人的威胁，伯益之外还有两个东夷首领有穷氏后羿和寒浞先后篡位代夏。甘之战后还有启征西河，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后相二年征黄夷，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不降六年伐九苑，后桀伐岷山……^{[21]3-10}桀伐岷山是夏代末年重大事件。《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妹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清华简《尹至》记载“(桀)宠二玉”。羌人出身的姜太公等与姬姓周人共创了周王朝。汉亦

兴于蜀汉，与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启本人是羌夷结合的产物，夏朝亦是羌夷战争的结果。羌人转变为夏人、周人、汉人是历史大趋势。故费孝通认为羌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古羌人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转化为夏人、周人、汉人，而且融入了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土家族等民族，还是当代羌族的直系祖先。

考古学发掘与研究可以证明历史记载夏代开始进入父死子继的父权社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墓葬有贫富分化，但男女仍然相对平等，父系还是母系之争尚无定论。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赤裸裸的男女不平等，齐家文化时代的柳湾、皇娘娘台、秦魏家遗址就是典型代表。柳湾墓地发掘马厂类型墓有1000余座，贫富分化明显但看不出男尊女卑。齐家文化墓葬中有合葬墓23座，合葬墓中成对成年人合葬墓有16座，一位死者仰身直肢躺卧棺内，另一人则被置于棺外。这清楚地显示棺内死者地位居尊，棺外死者处于从属地位，而被置于棺外死者是女性。确定性别合葬墓中，女性尸体旁的工具是纺轮，男性随葬工具为石斧、石刀、石凿、石镞，可见男女分工已经明显。M314男仰身直肢平躺于木棺内，40余岁；女在棺外右下角侧身屈肢面向男性，一条腿被压在棺下，16-18岁，显然是为墓主人殉葬^{[22]259}。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发现10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和2座一男两女合葬墓，主要通过葬姿和陪葬物来体现男尊女卑^[23]。秦魏家遗址上层24座合葬墓中有15座成人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侧身直肢或俯身直肢居右，女性屈肢侧身居左，生动地展示了女性卑躬屈膝形象^[24]。张忠培认为齐家文化葬制达到了恩格斯说的父权统治典型阶段，应该把齐家文化时期划入父权制时代^[25]。

陕北地区神圪塔梁遗址发现了石峁时代保存器物完整组合的大型墓M7，口小底大竖穴土坑墓，墓底中部有一具长方形原木棺，墓主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棺外西侧有一女性人骨，侧身屈肢，四肢呈捆绑状，面朝棺材^[26]。壁龛中有六件陶器组合：斝、折肩罐、两只壶或尊、两只双耳杯(原报告分别称之为盆和双耳壶)，其中一

只大双耳杯是典型齐家风格。最近石峁遗址次级聚落出土了典型齐家文化的男尊女卑墓葬：一类大墓共三座有木棺、有壁龛、有殉人，男性墓主葬于木棺内，仰身直肢，随葬3至4件玉器；女性殉人位于墓主左侧棺外，侧身面向墓主，身上可见劈砍迹象。墓主右侧墓壁上有一半月形壁龛，龛内一般放置5件带石盖陶器，另有1至2件细石刃^[27]。《史记》记载夏代世系显然是典型男权父系社会。考古发现齐家文化或石峁社会与历史记载夏代社会状况正好吻合。

齐家文化至今没有发现大墓，可能与火葬文化有关。周先人和夏人可能实行火葬，亦可能是至今没有发现夏代和周代王室墓的一个原因。齐家文化继承了东亚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传统，又从中亚吸收了洞室墓、火葬及男女合葬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墓葬文化。齐家文化墓葬的多样性反映了夏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亦可佐证齐家文化是夏文化。竖穴土坑墓、洞室墓、火葬墓体现了民族文化和信仰多样性，男女合葬墓体现了母系社会到男权社会变革。齐家文化与夏朝不仅社会性质相同，又大体处于同一时空范围，从墓葬看可以肯定地说齐家文化就是夏代文化。

考古发现和研究亦可证明甘之战建立夏朝时已进入干戈王国。玉戈和铜戈均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但其源头可追溯到石峁或齐家文化。大型玉刀与玉戈是二里头、石峁遗址或齐家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刀长达64厘米，共出土相对成熟的玉戈三件，可以追溯到石峁文化玉戈。三件石峁玉戈中有一件墨玉戈长29.4厘米，无援无胡较原始^[28]。齐家文化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众多玉刀，亦出土了玉戈形器和铜戈形器。喇家遗址M12与璧同出的戈形玉



图1 青海省博物馆展出宗日遗址齐家文化层出土戈形器(2016)



图2 青海博物馆展出沈那遗址出土铜矛(2016)

片可能是戈的始原^[29]。此外，宗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平面呈三角形的戈形器，残器长8.7厘米、宽2.2厘米，中间有脊，“戈形器”亦可以作为戈起源于齐家文化的一个佐证(图1)^[30]。

戈被认为是夏民族或夏文化象征之一。从玉石戈到青铜戈的演变过程可以揭示戈的演变伴随着国家形成的过程^[31]。赛伊玛—图尔宾诺铜矛见于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图2)，河南、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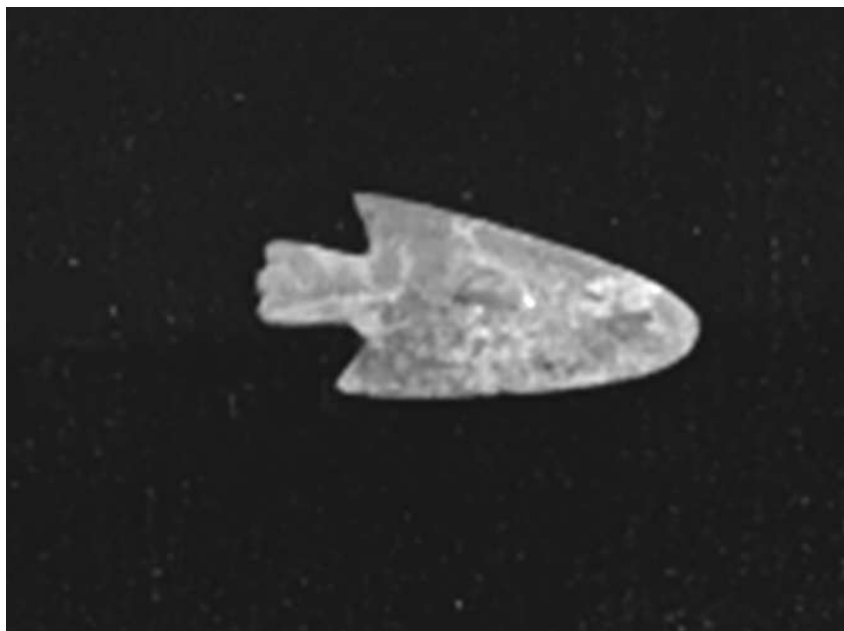


图3 青海省博物馆展出柳湾遗址齐家文化层出土铜箭镞(2016)

辽宁等地亦有分布^[32]。铜斧亦见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和二里头遗址^[33]。

中国境内最早的铜箭镞见于青海柳湾遗址齐家文化层和石峁遗址中晚期。二里头遗址、石峁遗址、柳湾遗址齐家文化层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青铜箭镞,标志着弓箭已成主战兵器。在此之前石制或骨制箭镞主要用来狩猎,青铜箭镞成为远射兵器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图3)^①。

石峁、二里头遗址是两大夏代纪年之内的王都城址。夏代开始之时,良渚、石家河古城已经崩溃,唯有齐家文化方兴未艾,石峁古城欣欣向荣。石峁遗址早期是一座龙山文化古城,中期开始受到齐家文化或西北青铜游牧文化明显影响,出现了牛、羊、马和青铜器,还有齐家文化风格的墓葬、陶器和卜骨。马面、瓮城和皇城台等表明石峁遗址是都城遗址;祭祀和占卜是凝聚人群的核心手段^[34]。石峁遗址中期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吸收了游牧文化,玉戈、铜镞表明战争迹象日益明显,男女明显不平等。夏代开始之际陶寺古城已被摧毁,二里头古城尚未兴起,石峁遗址正是东亚无与伦比的大城,最有可能是夏代首都。

石峁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羊骨,表明石峁时代已养羊成风。羌人以养羊著称,石峁遗址可能与羌人有关。石峁遗址和齐家文化居民一样用牛羊肩胛骨占卜决策,羌人继承了骨

卜传统。《四川总志》记载松潘地区“灸羊膀以断吉凶”。《茂州志》:“占卜…或取羊膊以薪炙之,验纹路,占一年吉凶,曰灸羊膊。”石峁遗址石砌建筑众多,羌族继承了石砌建筑传统,碉楼和民居都是证据。口弦是石峁遗址居民和羌人共同喜爱的乐器。2016年—2017年皇城台发掘出20余件形制多样的骨制口弦,距今约4000年,制作规整,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八至九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一至两毫米。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正式发掘出土年代最早、数量

最多的簧乐器,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口弦承担着沟通人神天地功能,是一种世界性乐器,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口弦与羌笛一样是羌族特色乐器,“小小竹片中间空,麻绳扯奏响叮咚,房前屋后碉楼上,花前月夕起春风”。羌族口弦表演形式大多为独奏或合奏,口弦和羌笛均已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城迁移是普遍现象,商王朝有“前八后五”之说;夏王朝也会有多处都城^[35]。石峁遗址位于峁上称之为阳城正合适,当是夏王朝第一个都城。《今本竹书纪年》云:“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尚书·禹贡》:“壶口治,梁及岐。”孔安国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石峁、二里头正位于雍冀之间。从石峁到二里头顺黄河而下十分方便。逐鹿中原,北魏、唐、辽、金、元、清重演了夏、商、周、秦、汉五朝史。鲜卑从东北进入蒙古草原发展壮大从平城迁都洛阳,鲜卑后裔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入关中建都长安,东都迁洛阳,忽必烈初都长城外称上都,入长城始称大都。满洲从东北进入中原也是先定都长城外,后迁都长城内,还在长城地带建立避暑山庄作为陪都。龙山文化晚期高墙林立,齐家文化缺城少墙;二里头显然是座移民新城。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二

里头居民不少来自西方或北方,当然也有来自南方或东方,显示是丰富遗传多样性^{[36]29-46}。族属复杂化证明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移民城市^{[37]136}。其实石峁位于东西交流、南北互动的要冲,亦是更早的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

长城地带或所谓四百毫米降雨线不仅是农牧分界线,更是农牧经济与文化接合部。石峁遗址是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代城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石峁遗址位于半月形文化带的核心地区,正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结晶。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都城的,石峁作为夏代首都绝非偶然。结合历史记述与考古发现可以从年代、时代、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证齐家文化正是夏代遗迹,而石峁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分别为夏代的首都和末都。

四、讨论与结语

神话传说与民族历史考古相结合,大致可以复原大禹西羌与华夏历史的关键。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一部记述中国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347年)的历史、地理、人物著作,与《越绝书》并称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华阳国志·序》云:“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禹贡》九州之梁州在华山之南而得名“华阳”。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华阳、华阴表明秦岭曾经是泰华或华山。《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右泰华就是秦岭或华山,历代古籍中泰华与秦岭交叠出现,意义大体相同。《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而宝鼎辉光于中流,离龙仁虎跃乎渊陵。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穆》之咏,侔乎《二南》。”《山海经·西山经》云:“华山一名太华。”《白虎通》云:“西方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

华,故曰华山。”《华山记》云:“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清代胡渭《禹贡锥指》云:“《山海经》有阳华之山,即华阳”,“其地即古阳华藪,盖藪因山得名,山藪在华山之阳,正禹贡之华山也。”

《华阳国志·巴志》云:“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鯀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修……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职方氏犹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贯利,迄于秦帝。汉兴,高祖借之成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江州县郡治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国为夏朝少康庶子后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东汉赵晔编撰《吴越春秋》与《华阳国志》遥相呼应,亦明言吴越统治阶级分别来自大西北周夏王室。《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云:“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郤氏之女姜嫄,为帝誉元妃……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盛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太伯、仲雍望风知指,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后稷之母姜嫄与羌人相关。《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观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之后大会计治国之道,更名茅山为会稽之山,国号曰夏。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葑梓桐棺,穿圻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启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无余。无余传世十余,禹祀断绝……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生无暉,暉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暉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越之兴霸自元常矣。由此可知,吴越统治阶级均源自大西北羌禹或姬姜,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一家之言,亦被吴越传说与

历史证实。近年考古新发现亦证明司马迁归纳总结不无道理。良渚文化早于夏,相当于虞朝,琮、璧、钺、璜进入中原,加上龙山文化圭、璋、刀,演变成齐家文化或石峁玉礼器体系。传统农耕礼乐文化与外来青铜游牧文化结合形成了复合文明。东亚定居农业文化只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三代西北青铜游牧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38]。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宮括。”虢叔、闾夭、散宜生、泰颠、南宮括难以详考,出身戎狄可能性很大。史载黄帝后裔戎狄与周人皆有姬姓。白狄与周人同姓,说明他们同族。周人出自白狄,与其通婚者为戎族,自称则为“有夏”。“夏”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是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而入主中原,与大禹、炎黄、羌姜、戎狄、鬼方、匈奴都密切相关^[39]。夏商周秦汉唐无不兴于大西北,北魏辽金元清亦然。周人宣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者。周人是两大姓氏通婚而形成的民族,周人父系为姬姓,而母系来源多为姜姓。《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周族的祖先后稷是姜原所生,母系来源于姜。后来姜姓一直在周朝发挥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姜子牙与周武王共创周朝。清末王闿运著《尚书笺》在《康诰》“肇造我区夏”直言:“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

禹兴于西北羌戎葬于东南会稽是中国历史大势缩影。大禹治水征三苗划分九州为夏王朝建立奠定了基础。章太炎指出华、夏、汉祖先居住在雍州和梁州,“然神灵之育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曲城,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华之名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地在雍梁之际;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

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溢”^[40]。

注释

①2016年8月“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邵晶展示了最新出土铜镞和石范。

参考文献

-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M]//“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篇·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
- [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M]//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
- [4]徐中舒.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M]//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局,1992.
- [5]翦伯赞.先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M]//古史辨: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7]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8]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1(1):117-152.
- [9]李德书.大禹传[M].天地出版社,2010.
- [10]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考古学报,2017(3):287-316.
- [11]赵林.商代的羌人与匈奴:试论产生中国人的若干体质与文化上的背景[D].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5.
- [12]白川静.羌族考[M]//甲骨金文学论丛:第九集,1958.
- [13]姚孝遂.商代的俘虏[M]//古文字研究:第一期.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5]王国维.古史新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 [16]郭长江,等.孺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19(3):9-19.
- [17]陈民镇.新出孺加编钟所见“禹”与“夏”[N].中华读书报,2019-09-25(15).
- [18]王吉怀.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及学术意义[J].东南文化,2008(1):20-25+98-99.
- [19]杨希枚.杨希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 社, 2006.
- [20] 谭其骧.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 [21] 帝王世纪·世本·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M]. 张洁, 戴和冰, 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 [2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 青海柳湾: 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23]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J]. 考古学报, 1978(4): 421-448+517-528.
- [2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75(2): 57-96+180-191.
- [25] 张忠培. 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 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墓地的若干分析(续)[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2): 31-42.
- [26] 王炜林, 等. 陕西神木县神圪塔梁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6(4): 34-44+145.
- [27] 邵晶, 裴学松, 等. 石峁文化次级聚落: 陕西府谷寨山石城考古首次全面揭露石峁文化大型墓地[OB/EL]. 文博中国, https://www.sohu.com/a/420734886_381579.
- [28] 戴应新. 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M]//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续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 [29] 邓淑苹. 万邦玉帛: 夏王朝的文化底蕴[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夏商都邑与文化: 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30] a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 等.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8(5): 1-14+35+97-101; b 格桑本, 陈洪海主编. 宗日遗址: 文物精粹论述选集[M].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9.
- [31] 叶舒宪. 戈文化的源流与华夏文明发生[J]. 民族艺术, 2013(1): 24-31.
- [32] 林梅村.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J]. 文物, 2015(10): 49-63+1.
- [33] 邵会秋, 杨建华.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布[M]//边疆考古研究: 第10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34] 孙周勇. 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 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J]. 考古与文物, 2016(4): 70-79.
- [35] 孙庆伟. 颛宅禹迹: 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 [36] 刘皓芳. 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D].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37] 许宏. 最早的中国[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38] 易华. 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J]. 中原文化研究, 2019(5): 5-13.
- [39] 易华. 夷夏先后说[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 [40] 章太炎. 中华民国解[N]. 民报, 1907(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 Qiang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Yi Hua

Abstract: Dayu came out of Xiqiang, controlled the flood in Jiuzhou, united in Tushan, conquered Sanmiao and collapsed in Kuaiji, which is not only a legend and a myth, but also a historical site. Yu came out of Xiqiang, also known as Xirong. Xiqiang and Dongyi allied in Tushan, conquered the southeast and conquered the northwest of Sanmiao. Yu Mausoleum in Kuaiji remained. Dayu's son inspired the war in Gan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establish the Xia Dynasty. From then on, the era of fighting kingdom enters in patriarchal society. In *Yu Gong*, Yong and Liang are the bases of Qiang people. The three generations are exactly the history of the collision and blending between northwest Qiang people and Southeast Yi people. The Qijia culture runs through the Xia Dynasty. Shimao and Erlitou sites may be the capital of the first and last Xia Dynasty. The legend of Huashan or Taihua and Huaxu is also related to China. The combination of mythology, legend, history,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n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 qiang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Yu; Qiang; Xia; Qijia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原 孟]